

## 第一章

# 滋生邪恶的土壤

### 一 人的善与恶

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今天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这又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人的善与恶。无论是主张性本善者还是性本恶者，都不否认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也都主张抑恶扬善、去恶从善。在研究犯罪行为或伦理道德行为时，人的生物基础、遗传基础是学者从不放过的一个方面。他们拿出许多证据，说明人的长相、人的遗传基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位英国精神病专家拍摄了大量罪犯的照片，试图说明具有某种长相特征的人是犯罪相，如后倾的前额、小眼睛、鬼祟的神态、野兽般的身体等。

单从人类的生物因素来解释人类的种种邪恶显然是不正确的，过分夸大人的好斗性、攻击性、贪婪性，以此说明今天人类的冲突、战争、犯罪、暴力等，也是不全面的。但人生来具有的本能和欲望是人类种种罪恶的基础之一，是人类内在的原因。追求生存、享乐、荣誉这是人之常情，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否则今天人类恐怕还围着块兽皮住在山洞里。然而，这种追求和欲望如果无限制膨胀，就会产生邪恶。由于欲望与邪恶的这种关系，也就有了这样的争论：是“为富不仁”，还是“富能生德”，邪恶是

生于富裕还是生于贫穷？

富裕和贫困都不是犯罪的绝对条件。一些人因为生活所迫走上犯罪道路，但生活同样贫苦的人并没有都走上这条道路。而一些人犯下滔天罪行并不是为生活所迫，近来白领阶层经济犯罪日益突出，这些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公司经理大概还没有贫困到非在慢慢饿死或犯罪两条道路上作出选择。一些人贪污腐化也不是因为他们生活贫困、地位低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太多的权力。这说明人类种种邪恶的产生与人的野心、欲望有关。

生活贫困的人感到要靠正常劳动富裕起来非常艰难，于是有了抢劫、偷窃，有了海盗，有了毒品贩子、人贩子。他们知道干这些事有坐牢杀头的危险，但他们都怀有侥幸的心理，一旦得手，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保证。贩卖毒品、贩卖人口的收入显然要比种地、打工，来得快，来得多，对生活艰难、贫困的人来说这种诱惑是难以抵御的。但对金钱、地位、权力、荣誉贪得无厌地、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野心无限制地膨胀，也会产生邪恶。

人类总是要为一定的利益争夺，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等等。如果在利益的争夺中，社会上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占据上风，就会导致冲突，导致邪恶。从街头暴力、刑事犯罪到民族战争、国际战争，都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而导致的。不可否认，一些战争或暴力，尽管它们对人类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它们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我们在这里将它们归于邪恶之类。

个人的欲望要受到限制，那些由人组成的集团、单位、企业，那些民族、国家，它们的欲望同样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今天，一些人、一些企业为了赢利不择手段，假酒、假药、假种子、各种伪劣产品，无奇不有；一些集团、组织，它们的营业范围是卖淫、贩毒、贩卖人口、贩卖有毒废料；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挥霍人民

财产，成千上亿，从不觉多；一些民族、种族，一些政治党派，似乎永远达不成谅解，彼此都为本族、本党的极端利益而厮杀，结果导致没完没了的内战、种族残杀、国际冲突。所以我们说，人的贪婪和野心是产生邪恶的生理基础。

## 二 人类的道德危机

人类道德的滑坡、精神世界的空虚同样助长了邪恶。

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学者、普通百姓都在提倡这一口号，这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到了该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中国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尽管许多人抱怨今天社会风气恶化，存在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抱怨今天的社会不如 50、60 年代稳定，人们的道德不如那时高尚，但大多数人都承认今天比过去好。因此有人说：今天不如昨天，但今天比昨天好。这反映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但正如一些人指出的那样，人们的道德水平，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并没有同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一道前进，反而出现滑坡。

在中国人大声疾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西方的政治家、学者也在为同样的问题而担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谈论着同一个问题：人类在取得技术进步的同时，精神文明发生了危机，出现了信仰与道德上的混乱和堕落。这一危机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在解体后的苏联和前东欧国家，也出现在开放后的中国。因此有关人类道德的问题已引起全球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1983 年邓小平对印度客人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

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sup>①</sup>1992年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的同时，他又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丑恶现象。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其中之一便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sup>②</sup>

江泽民、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道德危机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他们在讲话中也点到了这些问题，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败现象、社会治安恶化、经济犯罪、吸毒、嫖娼等。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对精神、道德方面重视不够，导致这方面的空白和混乱。但原因并不如此简单，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西方文化、各种思潮对共产主义价值观念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要抵御这种冲击的负面影响，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水平、道德水平，是我国在下个世纪面临的艰巨任务。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极端无度的个人享乐主义、道德堕落、精神空虚，这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灾难，它将导致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导致各种犯罪的丑恶现象的滋生。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著作中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进行了分析，那本书的名字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28页。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

为《大失控与大混乱》，作者认为，21 世纪之前全球将处于大失控和大混乱的时期。他的观点是：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共产主义已经失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道德方面濒临困境，如果不纠正这种趋势，西方民主就会失去吸引力。布热津斯基虽然站在反共立场上，但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道德败坏、文化堕落、纵欲无度、精神空虚、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深恶痛绝。他痛斥传播媒介是导致道德败坏的罪魁祸首，痛斥好莱坞和电视制片是文化颠覆者，传播着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他指出了由法院制度替代道德标准和宗教的弊端，认为美国社会出现的金融丑闻、贩毒吸毒、街头犯罪等都是这一弊端的后果。他认为如此下去，自我约束将让位给暴力，自我控制将被腐败所替代。<sup>①</sup>

如果说政治家更多地从国家和政府的利益考虑道德危机带来的后果，学者、宗教人士则更多地从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环境来考虑道德混乱将导致的灾难。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两位关注人类道德的知名人士，一位是英国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另一位是日本宗教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他们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一个信奉基督教，一个信奉佛教，他们从宗教的角度谈到了人类文明和道德水平问题。他们认为人类即将跨入 21 世纪，但其道德水平并没比原始社会高多少，人们所说的进步只不过是技术的进步，这与道德的进步不是一回事。因为如果没有道德的控制，技术也可以被用于罪恶的目的。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的欲望被无限地引诱出来，放纵无度的欲望将导致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因此他们呼吁发达国家在扩大物质福利的同时，要加强对精神福利的投入。今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后的福利社会应该将教育、宗教、文化等精神福利放在首位，把物质福利放在第二位。

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奇先生在从未来学角度探讨人类前途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提出：任何进步首先是道德、社会、政治、风俗、品行的进步。他将此称为“文化进步”，认为当今社会看上去如此进步，却对许许多多的威胁无能为力，正是因为忽视了文化的进步。他提出警告说，人类在道德上和在生态上一样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他提出人类过于注重物质满足，忽视了文化和精神上的需要，使人的素质面临危机。<sup>②</sup>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各界人士如此关注人类道德问题不是无的放矢，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威胁都与人类的精神、道德水平有关，与人类自身的素质有关。人不同于动物，人要讲人性、讲道德。如果人类所信奉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么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干的？如果人在从事杀人、放火、奸淫、偷盗时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不担心受到惩罚，那么人也就禽兽不如了。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是人的聪明才智进一步展示辉煌的时代。人类越来越成为自然的主人，正因为这样，人的自身素质才变得更为重要。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和睦，取决于家庭成员的素质；一个城市是否整洁有序，取决于城市领导与市民的素质；一个国家是否繁荣昌盛，取决于国家领导和国民的素质。这里的素质显然不仅是指人的技术水平、学历高低，更重要的是指人的道德、品行。佩奇认为，当技术被用于罪恶目的时，当科学运用出现巨大失误时，应该归罪于领导者，归罪于社会重商主

见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

〔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世界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5页。

义、军国主义和社会的愚昧无知。不负责任、贪得无厌、个人主义等人类的错误现象都是导致灾难的根源。

### 三 社会不平等的恶果

从西方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都曾无情地揭露了私有制是产生邪恶的根源。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私有制的出现破坏了人类自然的平衡，是不平等的第一步，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他曾描述道：“平等一被破坏，继之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混乱。这样，因为富人的豪夺、穷人的抢劫以及一切毫无节制的情欲，扼杀了自然怜悯心和还很微弱的公正的声音，于是使人变得吝啬、贪婪、邪恶。”<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看到了人对人的剥削，恩格斯曾指出，贫困使工人阶级走向堕落，使他们牺牲了人类本性中优良的品质。使他们在要么慢慢等死，要么自杀，要么偷窃这几条道路上作出选择。<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理想，指出了一条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使人类获得解放的道路。

人类在建立更公正的社会制度的道路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改革，人类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的危机中寻求改革的途径。消灭私有制、建立更美好社会无疑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显然不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它的种种弊端早已暴露，但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社会不平等将带来的后果，它们在解决失业、贫困、

见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世界一百页》第 63 页。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6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03 页。

两极分化、建立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目前还在初级阶段，有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人类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实践。尽管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有不同之处，但在发展经济、消灭贫穷方面基本是共同的。

贫困，尤其是悬殊的贫富分化，是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阶层贫富的不平衡，是一个国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全球各地区、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则是全球不稳定的因素。21 世纪人类将继续面临贫困的挑战，全球将继续面临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动荡。

结束折磨着全世界几亿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极度贫穷，这是一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我们大家去完成的工作。这项工作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极度贫穷是一场全球性悲剧，这场悲剧波及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它既威胁最贫穷国家人们的生活，也威胁到最富裕国家人们的生活。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1993 年 10 月 18 日  
在消除国际贫困日上的讲话<sup>①</sup>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平等的世界，大小不等、权力不等、资源分布不等、经济发展水平不等、贫富不均，在 21 世纪，这些差距不仅不会消失，在某些方面或某些国家和地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世界看，存在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许多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看，无论是穷国还是富

<sup>①</sup>《联合国纪事》，1994 年 3 月中文版，第 11 卷，第 1 期，第 3 页。

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又都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仍然受着贫穷、饥饿、居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失业等困苦折磨。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和不平衡感，在这种情况下，是极易产生暴力、恐怖、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因此，社会不平等、贫富不均都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之一，是产生种种罪恶行为的土壤，它对穷人、富人，穷国、富国都是威胁，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们常提到的南北差异，也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这只是种种差异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广大亚、非、拉国家在民族独立前经济都非常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独立后，这些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一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飞跃，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差，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教育和科技水平低下，债务沉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些国家发展较快，被称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由于各种原因，另一些国家的情况则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联合国将它们划归为最不发达国家。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了。

1990年，世界银行对世界贫困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测定，指出世界上有10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每年靠不到370美元过活，这些贫困人口将近一半生活在南亚。从1974年到1994年这20年里，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由29个增加到49个。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加了40%。据预测，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为13亿，而且正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球赤贫人口将达到15亿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

34%将生活在贫困之中，大约是 2.6 亿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虽然比南亚和南部非洲要高出四、五倍，但那里的贫富差别之悬殊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无法相比的。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这个地区将最富有者所交税的 2%拿出来，就可以使该地区所有的穷人上升到贫困线以上。<sup>①</sup>与此同时，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60年代它们之间相差为 30 倍，到 1991 年这种差距达到 60 倍。占世界人口 20%的富人，拥有世界总收入的 83%，占世界人口 20%的穷人，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 1.4%。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以帮助那些贫困者。但今天，贫富差距在各国都存在，只是有的国家差距小些，有的国家差距大些。一些富有的发达国家虽然采取了高福利政策，但还是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少数民族、移民、黑人等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相对更差些。在 90 年代，美国最穷的 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 4.6%，最富有的 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 44.3%。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深为美国的贫困问题感到脸红，他在著作中写道：真够丢人的，总共有 32.7%的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还有 11.3%的白人处于同样的困境。他认为这些人是生活在与全球超级大国极不相称的地位上。<sup>②</sup>

在世界另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没有美国这么大，但穷人到处都有，平衡两极差距几乎是所有国家政府面临的问题。在韩国最富有的 1/5 人口人均收入是最贫穷 1/5 人口人均收入的 8 倍。日本的情况好一些，1/5 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是 1/5 最贫穷人口的 4.3

《联合国纪事》，1990 年 10 月，中文版第 7 卷第 3 期，第 48 页。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17 页。

倍。美国、法国的差距大约要比这高出一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更为悬殊，例如拉美地区的巴西、巴拿马、危地马拉等国家，贫富差别高达30多倍。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上发展就极度不平衡。解放后，党和政府努力消除不平衡现象，缩小了各地区及各行各业在发展和收入上的差距。但由于过于强调平衡、平均，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说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各地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原本有能力、有实力的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另一些人和地区也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但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摆脱了共同贫困的同时，我们与共同富裕还相距甚远，而且我们的贫富分化变得越来越悬殊了。这些差距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方面，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

1949年到1979年间，中国东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之比是6.81比7.25，到了80—90年代，这一比数为19.88比15.78，东部明显超过了西部。1980年西部人均社会总产值占有额比东部低47.3%，1991年低57.3%。1965年东西部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为28%，到1991年扩大为46%。据专家测算，1994年，我国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最贫穷的20%家庭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27%。<sup>②</sup>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情况，此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超过0.4属于差距过大，0.6被定为警戒线，达到0.6则说明贫富差别已经

吴鹏森：《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问题》，《探索与争鸣》，1996年1期。

何青莲：《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书摘》，1996年第2期。

极端悬殊，有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可能。1994年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3，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差距过大之行列。<sup>①</sup>这不是说我们过去搞的平均主义正确，而是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忽略两极分化的倾向，值得我们高度注意。这种倾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中也普遍存在，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历史原因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外，人口爆炸危机是加剧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人口危机导致我们的地球拥挤不堪，土地、水、森林等自然资源面临危机，环境污染，粮食、能源也日益短缺。但人口过剩带来的灾难远不止这些。大量贫困的、过剩的、不安于现状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穷国流向富国。移民、流民、难民，合法的，非法的，借助着各种交通工具，涌进涌出，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国家和社区的管理带来极大困难，也使不同背景的人之间关系恶化。

设想一下，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那些一家老小挤在破烂窝棚里的人，还有那些无家可归者，他们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得不到起码的医疗卫生保障，饥不裹腹，衣不遮体。他们眼下的生活贫困不堪，未来的生活看不到希望，因此他们极易铤而走险，极易产生对社会、对他人的仇视和破坏行为。

设想一下，那些背井离乡的人，那些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血汗养家糊口的人，他们没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在各种待遇上受到歧视和排挤，时常为自己的不合法地位担惊受怕，在种族、文化、宗教及生活习惯上也与当地人格格不入。他们很容易卷入

① 何青涟：《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书摘》，1996年第2期。

暴力冲突以及恐怖活动中，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人口增多又是导致失业的一个因素，失业又加剧了贫困，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和犯罪。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调查，美国的失业率每增加 1%，杀人犯罪率就增加 5.7%，进监狱的人数将增加 4%。

贫困以及悬殊的贫富差异、不公正的地位和待遇是产生失望、堕落、仇恨、犯罪和暴力的温床，这早已是众人皆知的历史，但这种现象今天仍在继续，而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进一步扩大和失控的危险。如果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不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就无法阻止由此导致的种种犯罪行为，受危害的将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人类的和平与安全。

1968 年，一些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士组成了“罗马俱乐部”，探讨人类未来面临的种种挑战。该组织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在谈到由贫困、两级分化以及人口过剩导致的灾难时忧心忡忡。1981 年，他在《世界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一书中描述了由此而引发的一场世界冲突：本世纪末第三世界的人口将达到 50 亿，而目前他们还不能解决一半人口的吃饭问题。由最穷地区组成的“第四世界”最有可能引发反抗的火花。因为当人口老化的富国仍保持某种富裕生活时，“第四世界”或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可能会因不愿长期忍受毫无希望的命运而起来反抗。这将是一场使用所有武器的复杂而残酷的危机，它将像点燃的导火线一样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

在人们仍为美苏争霸导致的世界大战担忧的时候，有人已在描述一场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这是值得深思的。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引起人类的关注。

## 四 民族主义 —— 仇恨与冲突的种子

我们的世界拥有大约 2 千多民族，还有数以千计的部族。现今，人类就生活在这众多的民族世界之中。有的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有的好几个、几十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有的民族集中在一个国家内，有的民族分散在若干国家中。

一提到民族，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差异，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继而，人们可能更联想到民族之间的隔阂、仇视、冲突。的确，无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无论是 17、18 世纪，还是 20 世纪，民族冲突比比皆是。民族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征服与反征服，分离与反分离，导致了无数的民族冲突与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一页页血与火的篇章。在 21 世纪，民族问题不但不会降温，反有成为热点的趋势，民族矛盾像一颗颗火种，遍布世界。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恐怖活动、种族屠杀乃至大规模战争，时刻威胁着人类，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历史发展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已经结束，世界不正在兴起一体化、全球化的热潮吗？但在国际舞台上，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持久力，也最为活跃。今天，虽然科学技术、经济贸易、交通通讯正在把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体化、全球化正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存在民族、宗教、文化等差异，相互敌视、分离、对立的势头也同样非常强劲。这股势头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而减弱，在 21 世纪可能会更为突出。

民族不等同于国家，它比国家更复杂、更丰富。国家主要是政治实体，它以国土、国民、主权为基本特征，一国内可以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而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感情、

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特征使民族主义更具凝聚力、号召力、反抗力和战斗力，还有前面提到过的生命力、持久力。在历史上，民族英雄们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诗篇，流传千古；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也发生了扩张、侵略、屠杀。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都是以民族、种族的名义发起的。反抗外族压迫、抵御外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是民族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歧视、压迫、以至征服、灭绝其他民族，这也是民族主义。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忠诚，对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就是灾难。因此，从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阶段看民族主义，它都有不同内容。20世纪末，一次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席卷世界，这自然也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

冷战时期，由于受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制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被抑制，民族冲突要么被美苏所利用，要么处于次要地位。一些国家为了抗衡前苏联或美国的影响，出于战略利益考虑建立起联合战线，并暂时将它们之间的民族矛盾搁置起来。冷战结束后，前苏联解体，华约解体，过去对民族的压制和束缚放开，伴随着权力之争、领土之争、财产之争，在不同势力的影响下，各民族纷纷要求独立。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要求独立，前东欧国家的各民族也在要求独立。看看现在俄罗斯境内和其他前苏联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恐怖活动，看看冷战后前南斯拉夫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没有迹象表明在21世纪这一地区会风平浪静。民族之间的新仇旧恨将导致冲突、恐怖的恶性循环。

前苏联东欧地区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波及整个世界，不仅第三世界国家，连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分离要求也日趋强烈，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等。

此外，冷战之后，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化，在

前苏联解体和西方民主化影响的冲击下，80年代以来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开始了民主化进程。有的国家可能过渡得比较平稳，而另一些国家则因此陷入了激烈的党派和民族、部族之争。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原本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或部族之争，而多党制又加剧了党派之分，同时也激化了民族矛盾或部族矛盾。

民族矛盾是非常敏感的。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内，稳定是相对容易的，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对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际社会来说，要减少各民族的敌视和冲突，使所有民族能够和睦相处，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民族问题总是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处理民族问题不仅要求政府有公平合理的民族政策，要求各民族之间的发展、生活水平相对平衡，还要求各民族之间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但民族问题太复杂了，我们所追求的全球化、一体化，甚至和平都可能成为激化民族矛盾的原因。国际社会如不能使人类各民族化解怨恨，下个世纪还会发生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和种族残杀。

## 五 动荡不定的国际格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4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冷战。整个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相对峙，相对的意识形态，相对的政治制度，相对的军事集团，相对的经济体系。在两大集团之外还有其他中间势力，但整个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争夺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主线，其他矛盾和冲突要么无足轻重，要么从属于美苏冷战。国际关系学者称那个时代为“两极世界”，甚至是“严密的两极世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那时的国际冲突比作一棵卷心菜，说无论是什么冲突，只要你一层层剥开，就会发现其核心是美苏关系。

当时人们觉得处在冷战时期是多么可怕，担心两个大国失去

理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而且是一场核大战。但在今天，学者们似乎更看到那个时代的相对稳定之处：明确的两个对立集团，明确的势力范围，一套处理冷战危机的规则，怕引起世界大战而采取的克制态度等等。90年代末，世界格局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前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冷战结束了。世界开始了大分化、大改组，这一切发生得这么突然，许多看来至少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现的事出现了，许多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当西方人士欢呼冷战的结束，欢呼和平时代到来时，他们发现世界并没有变得比过去更稳定。一些地区的旧冲突刚刚缓解，又出现那么多新的冲突。联合国维和部队四处扑火，仍无法平息一场场民族冲突、种族残杀。

开始于80年代末的世界大转变所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它不会在短期消失，而将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就像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突然发生政府失控、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这势必要出现混乱。何况一个相对稳定的两极世界，突然分化成一个多极的世界，它所带来的动荡是何等之大。当今的世界呈何种格局，多极，单极，五极，无极，众说不一。过去的敌人，现今握手言和；昔日的盟友，今日反目为敌。过去的一个国家，今天变成了两个、三个甚至好几个国家；过去的两个国家，今天又合为一体。国家在变动之中，地区在变动之中，整个世界都在变动之中，让人觉得比冷战时代更捉摸不定。

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旧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社会保障等全都发生了变化，而新的秩序远未建立。经济在滑坡，物价在飞涨，失业人数在扩大，新的暴发户和贫困户不断涌现。政治家之间、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导致政府政策不统一，软弱无力。民族矛盾的火种被重新点燃，呈蔓延之势。武器和核材料有分散和失控的危险。社会不稳定，国内犯罪活动直线上升，国际犯罪分子乘虚